

人口原理的说明和例证

[英] 普雷斯 著

对外贸易学院译

商务印书馆

人口原理的說明和例証

[英] 普 雷 斯 著

对外貿易学院譯

商 务 印 书 館

1963年·北京

Francis Place
**ILLUSTRATIONS AND PROOFS OF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30

人口原理的說明和例証

〔英〕普雷斯著 对外貿易学院譯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字第107号)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

<KZ> 統一书号: 4017·66

1963年7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08千字

印张 9 $4/16$

印数 1—2,000册

定价(9) 1.30元

出版說明

本书作者普雷斯(Francois Place, 1771—1854)是十九世紀上半期英国的一个社会学者、馬尔薩斯主义者。早年比較貧苦,做过几年裁縫,后来又独力經營过一家成衣鋪。他同工会和工人运动有联系,曾担任几个工人俱乐部的秘书。1799年以后他开的小鋪子成为当时具有政治改革要求的人們經常聚会的場所。他曾参与人民宪章的起草工作,但沒有参加后期的宪章运动。

普雷斯生活的时代,正当英国进行产业革命的时期,机器的使用和工厂的建立加强了資本家对劳动者的剝削,使广大的手工业者失掉工作,成为“过剩人口”,資本主义經營方式以及机器和新的科学方法的应用,也使农业中使用的劳动力数量大为减少,由于大规模圈地运动而失掉土地的农民大量地流落到城市,变成无产者,遭受資本的无情奴役。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一方面給資本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一方面又使广大的劳动人民陷入了貧困的深渊,受着失业、饥饿、死亡的威胁和折磨,过着令人难以想像的悲惨生活。

怎样解释广大劳动者日益貧困的现象?怎样才能避免这种现象产生?这个问题逐漸引起了人們的深切注意。当时英国社会学家葛德文试图解答这个问题。在《政治的正义》一书中,他从唯理論出发,认为劳动者貧困的原因在于财产私有权和政治管理不善,主张废除私有制,建立平等社会。馬尔薩斯反对这种說法,专门写了《人口原理》一书来同葛德文爭論。他从統治階級的利益出发,力图把劳动者貧困的根源归結为自然原因和人类本性,即人口繁

12506/20

殖速度远远超过生活資料增长速度，提出要避免劳动者的貧困，惟有使他們的生命縮短、人口减少或者停止增殖。对此，葛德文写了專門著作来进行答辯，认为馬尔薩斯的看法是荒謬的、反动的。普雷斯的这本书就是为参加这个爭論而写的。

在这个爭論中，普雷斯贊同馬尔薩斯在人口問題上的基本論点，并竭力为之辯护。他搬用了許多經過歪曲的人口統計数字作为例証來說明劳动人民“貧穷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人口繁殖过速”。他认为劳动人口增长过快，大于資本积累的速度，因而劳动的供給超过劳动的需求，在“工資鉄則”的作用下，劳动者的实际工資自然要下跌，他們的生活水平也就要隨之日益下降。他认为这个“人口原理”是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时期經常起作用的。他认为馬尔薩斯否定政治、法律制度等对于群众生活水平的影响是錯誤的；适当的政治改革有助于劳动者生活状况的改善，但是他反对葛德文把貧困和罪恶的原因完全归之于社会制度，特別害怕由葛德文的理論导引出来的革命要求，他认为即使葛德文所主张的平等社会实现，由于上述关于人口和工資的“永恒”原理，人类依然不能免于貧困和罪恶。至于解除貧困的手段，他贊同馬尔薩斯所提出的通过“道德抑制”减少人口的办法，不过他不贊同实行晚婚和禁欲，而主张实行节育。他說：“按照智慮所及，經過理智的判定，可以采取生理上的預防措施，使劳动的供給能够經常保持在对劳动的需求之下，而人口数量能够經常保持在生活資料所能供应的水平上。”做到了这一点，“工資必然会提高到給所有的人提供舒适生活資料的地步”，劳动者就能过富裕、幸福、健康、道德的生活，人类社会就能取得长足的进步。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普雷斯在本书出版以后还写了許多小册了，并且在英国、通过他的信徒在美国开展了大规模的节育运动。資产階級經濟学者根据普雷斯所提出的控制人口的

方法同馬爾薩斯的主張有所不同這一點，在他們編著的人口思想史上把普雷斯的學說稱為“新馬爾薩斯主義”或者普雷斯主義。

馬爾薩斯的反動人口理論早已受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嚴厲駁斥，普雷斯為馬爾薩斯所作的辯護也是完全站不住腳的。我們知道，人口狀況取決於社會生產力和同它相適應的特定社會生產關係所構成的社會生產方式，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有不同的人口規律。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的相對過剩人口，是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發生作用的結果。普雷斯把勞動人口的相對過剩說成是勞動人口增長的速度快於資本積累的結果，這是倒果為因的說法。勞動者的收入和消費也不決定於什麼“工資鐵則”，而是服從於勞動力價值的規律，受絕對貧困化和相對貧困化規律的支配的。因此勞動者貧困的原因，不能到人口增長快於生活資料增長的“自然規律”或者什麼人類本性當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社會制度方面去尋找。普雷斯在本書中一再表示自己同情工人階級的境遇，他的主張是出於減除勞動者的貧苦的願望，並反對馬爾薩斯對勞動人民的誹謗和污蔑，但是他的立論和主張在當時的實際效果是擴大了馬爾薩斯反動人口理論的影響，模糊了勞動者的鬥爭目標，從而幫助了反動統治階級。

本書初版發表於 1822 年，中譯本是根據倫敦喬治·艾倫和恩文公司 1930 年的版本譯出的。原書附有普雷斯關於人口問題的許多通信、編者諾曼·希姆斯所寫的序言，我們覺得它們對於讀者了解普雷斯的人口理論、開展資產階級人口思想史的研究和批判工作有幫助，特一併譯出，供讀者參考。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

1962 年 12 月

目 录

原书編者序言	4
原作者緒言	39

第 一 章

馬尔薩斯与葛德文对人口問題的不同的看法——葛德文对《人口原理》的第一次答复——葛德文的第二次答复《关于人口增殖力的研究》	45
--	----

第二章 关于瑞典的情况

人口——死亡率表格——生殖力——关于葛德文对瑞典人口享有特殊利益这一說法的检查和駁斥——和美国的比較	57
--	----

第三章 关于美国的情况

第一节 引言——提出的問題——来自繁殖的人口增长，与瑞典相比——欧洲向美国移民的情况——来自大不列顛和爱尔兰的移民——国会統計数字——西伯特博士所著《美国統計年鉴》——美国移民法案——移民的数目——英国有关出国旅客的法律——1811年到1821年間，去美国的船只、吨位和旅客的数目——在美国的英軍逃兵——过去二十五年中移民的概数	68
第二节 美国由于生育而增加的人口——亨汗姆教区的例子——在朴茨茅斯——美国各主要城市的生命价值——在瑞典的情况——比較——葛德文的材料中美国人口因繁殖而迅速增长的例証	94
第三节 美国儿童的数目——瑞典儿童的数目——成年人的数目——每对夫妇生育的儿童数——成活儿童数——两国能生育的妇女数——美国社会比瑞典更适宜于人口的增加	101

第 四 章

論大卫·蒲士所著《論人口增长与生活資料增长的比率》	109
---------------------------------	-----

第 五 章

論古代国家的人口——某些国家人口稀少的情况——人类社会制度的弊病——例証——波斯——埃及——孟德斯鳩——葛德文关于人口原理的說法	131
--	-----

第六章 防止人口增长速度超过食物供应的手段

第一节 馬尔薩斯与葛德文关于这些手段的論点	138
第二节 英格兰人民防止人口增长速度超过食物供应的手段	148
第三节 作者关于防止人口增长速度快于食物供应的手段の論点	151

第七章 关于英格兰的人口

第一节 引言——第一历史时期——不列顛人——凱撒入侵时居民稀少的国家——第二历史时期——羅馬人——人口增加——第三历史时期——撒克逊人和丹麦人——人口大体沒有增加——1066年被諾曼人征服时估計約有二百万人口	166
第二节 第四历史时期，即自 1066 年諾曼人入侵到 1339 年爱德华三世侵略法国——在此时期内人口增加不大	174
第三节 第五历史时期，从 1327 年爱德华三世即位到 1485 年亨利七世即位	182
第四节 第六历史时期，从亨利七世即位时起到 1688 年革命为止	188
第五节 第七历史时期——从 1688 年革命到现在	191

第 八 章

英国死亡率之降低	207
----------------	-----

第 九 章

关于資本积累对人民福利的貢献——人口增长快于資本增长的结果——使用鋤子耕种——人口增长威胁着生活資料嗎？——爱尔兰的例子——人口的增长——低工資——愚昧——疾病	215
--	-----

第十章 結論

葛德文对政治經濟学的厌恶——如果没有充足的政治經濟学知識，这本书所阐述的學說就提不出来，人民的状况也就不能有重	
---	--

大的或永久性的改善	222
附录一	
关于美国的领土范围——和在 1790, 1800 及 1810 年数次人口 调查中的州与准州的数目	224
附录二	
关于从不列颠各岛移居到北美合众国的移民人数	228
附录甲	
关于马尔萨斯对节制生育的态度的注释	231
附录甲的注释	235
附录乙	
弗朗西斯·普雷斯关于人口与节制生育问题的通信	240
附录乙的注释	275
附录丙	
原编者对原文的注释	277
译名对照表	285

原书編者序言

重版这本书的理由

弗朗西斯·普雷斯(1771—1854)的著作在很长的时间里完全湮没无闻。虽然葛来汉·华莱斯早已在他极好的传记^①里承认了普雷斯事业的高贵及其深刻影响,包括他关于节制生育的努力在内;虽然有些学者论述了普雷斯在改造英国政治制度中所起的卓越作用^②,但是他不仅在英国而且在美国所发起的近代节育运动的努力的国际影响迄未得到承认。在公断马尔萨斯—葛德文的争论中,普雷斯反对马尔萨斯的道德抑制的补救办法(晚婚)^③,而主张用避孕办法来限制人口和家庭人数。这个虽非由他倡导^④而是由他首先作系统说明的

① 《弗朗西斯·普雷斯传》,1898年版和以后各版(乔治·爱兰·恩文公司出版)。波耶在《马尔萨斯及其著作》一书中没有提到普雷斯著作的重要性。阿弗雷德·马歇尔是近代经济学家中给予普雷斯一个应有的适当地位的最早的一位。他说:“普雷斯并不是没有看到他[马尔萨斯]的许多缺点,他在1882年曾给马尔萨斯写了一个辩解[不止是一个辩解],语调和论断都是非常出色的。”见《经济学原理》,第4编,第4章,第3节(1922年重印的第8版),179页注。这节引文第一次出现在第3版,1895年,第258页注中。

② 普雷斯所争取的改革是很多的:工会运动,工人教育,廉价邮费,出版自由,废除谷物法,废除联合法以及“知识税”。他还是宪章党运动和改革法案运动早期的一个积极参加者。见华莱斯前著;悉尼·韦伯:《工会运动史》;朱利叶斯·韦斯特:《宪章运动史》;马克·霍威尔:《宪章运动》(1918);韦克沃:《为出版自由而斗争》(1918)(乔治·爱兰·恩文公司出版)。

③ 参看《关于马尔萨斯对节育看法的注解》,附录一中有关道德抑制的定义。

④ 关于1800年前个人或团体对于节育的看法的零星作品留待以后叙述。卡桑德斯在他的《人口问题》里大略提到了这个问题(第8章,第17、29节;第10章,第9、15节。关于阴茎套的早期史略可参阅哈弗洛克·艾利斯:《性心理研究》,第6卷,第599页和以后几页。关于其起源和使用情况的广泛的德文书刊,则可从《累积索引季刊》,《医学索引》以及医学书籍的其他索引里找到。偶尔可以在医学刊物里看到关于原始居民采用闭塞子官口避孕的故事。这种粗笨的方法只会造成无血、感染以及局部或一般损伤的结果。除去这些没有什么效果的零星的关于避孕的早期著述之外,在英国,节育的历史是在1820年左右开始的。因为就在那个时候,普雷斯开始组织力量来说服群众。他介绍的方法如果妥当地采用是没有害处的,容易实行的而且是比较有效的。

理論，为后来成为或許是近代最重要的社会改良运动作了开端。普雷斯在政治經濟学史中第一次用他自己的名字提出了有說服力的避孕的論点，^①使他的《說明与例証》成为人口思想史上——也許甚至是社会思想史上——的划时代的著作，正像与馬尔薩斯以前各学派的強調国家主义^②相反的馬尔薩斯的以福利观点所作的解釋同样突出和重要。除了一些小册子以及在杂志和报纸上所发表的文章之外，这部书是普雷斯所写的唯一重要著作。^③由于它的存书稀少，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它在大学里人口、社会学及經濟学說史等課程里很有用，以及对节制生育运动(战后又恢复了)的关系，照我看来，此书值得作第一次的再版。这种逐行逐頁的翻版(用影印法)有点像最近皇家經濟学会重印馬尔薩斯第一次发表的《人口原理》——现在也是稀有的——的計劃。誠然，这是由于詹姆斯·波那博士的馬尔薩斯著作第一版的仿印，以及上述的考虑，使我感到出版普雷斯著作可能是有用的。

普雷斯的
早期生活

弗兰西斯·普雷斯生于1771年11月3日。他的父亲西蒙·普雷斯是“一个精力充沛而放蕩的人，最初做面包工人，后来在1771年做英国宫中法庭的执事德路列兰醋場債務人拘留所的看守人。”^④他父亲是个賭鬼，

① 詹姆斯·穆勒在这方面写在普雷斯之前，但只是不好意思地表示了一点意见。参看下面注57。

② 关于此点的精彩討論，可参看弗兰克·费特教授在被选为美国經濟学会会长时(1912年)以《人口增殖或繁荣》为题所发表的演说，载于《美国經濟評論》增刊第3卷第1号，1913年3月，第5—19頁。

③ 普雷斯曾編輯或准备发表一些著作，主要的是关于边沁的《不是保罗而是耶稣》以及罗伯特·欧文的《論性格的形成》等书。普雷斯也曾协助罗伯克編輯《人民小丛书》并指导发行廉价版的詹姆斯·穆勒的《論文集》。是他应威廉·罗維特之請，起草了《人民宪章》(1838)。他还企图去掉理查·卡莱尔的《妇女手册》里的一些糟粕，但是没有成功。《妇女手册》是第一部从医学观点以及社会观点来坦白地討論生育問題的英文論著)

④ 见葛来汉·华莱斯：《全国人名詞典》。

經常背弃家庭，普雷斯在家里常被老是喝得烂醉的父亲拷打，有一次当他父亲发脾气时，他竟不得不在不到十四岁的幼年出走到一个嗜酒的制裤匠家里。普雷斯年紀很輕就自謀生計，慣于和街头下流人做伴。1791年(那时他十九岁)，他和十七岁的伊利莎白·蔡特結婚。“他对他的生活有很大的道德影响，她把已沾染恶习但尚未浸透的丈夫从过去环境的泥坑中救出来。但是結婚也带来了經濟負担；两年后，有一次罢工使他和他的妻儿淪于悲惨飢餓的边缘达八个月之久，当时他找不到工作，經受了一次永难忘却的貧困的痛苦，这影响了他以后的經濟思想。”^① 华莱斯写道：“这是他的性格的极好的証明，在那几个月里，他勤勉地学习了他所能获得的关于数学、法律、历史及經濟学等的书籍。”^② 那时，普雷斯以一个帮工的身份，担任着几个工人俱乐部的秘书。

他获得了独立的生活，并产生了潜在的深远的影响

“普雷斯以其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异常的勤勉，在经历了各种变迁之后，逐漸地提高了自己的地位，成为一个富有的成衣师。在他的却林克劳斯的店鋪的后面一間屋子里，他积累了很多图书；就在这里，很多当时有名的政治家和文人来参考他的书籍，征求他的意见。当他成为人口問題的著名作家时，他已年达五十且已退职，有相当多的收入，对于当时的經濟和政治方面的见解有深刻的研究，同时作为一个社会改良的組織者起着潜在的深远的影響。”^③

① 菲尔德：《英国人口論的早期宣传运动》，載《美国經濟学会会刊》第4輯，1911年第1卷，第220頁。塔波特·格里菲斯在《馬尔薩斯时代的人口問題》第95頁上继卡桑德斯的錯誤(《人口問題》第494頁及31頁注)，錯誤地引用了这个題目。

② 見《全国人名詞典》。

③ 菲尔德：《英国人口論的早期宣传运动》，第220頁。

个人的經驗和理論的研究使他抛弃了馬尔薩斯的补救办法

在普雷斯看来，馬尔薩斯道德抑制的主张是完全荒謬的。菲尔德說：“他自己的早婚救了他。他甚至不能独身过相当过得去的生活到十九岁；对于在結婚前希望得到可靠的养家活口的手段的工作人来说，这种青年时代經歷的可怕景象就預示着要走上絕望的墮落道路。但是經驗同样有力地警告，早婚就是多子女。根据記載，他自己是十五个孩子（是在 1792 至 1817 年間生的）的父亲，其中五个在童年时死了。”^①无怪他悲痛地写信給恩索說：“道德抑制已在你和我以及穆勒和韦克菲尔德的例子中証明十分有用——我相信，我們共有不少于三十六个孩子……我們这样的人去教人作道德抑制真是罕见的。”^②

这样，普雷斯就漸漸被一种强有力的信念，一种几乎成为成见的见解所支配，从而认为馬尔薩斯的补救办法是不切合实际的，是永远行不通的，并且和葛德文的理想（社会可以达到完善的境域）同样是一种梦想（判断一个方案之是否一种梦想，就看它所要求的变革是不是人們性格与行为上一种革命性的变革）。普雷斯觉得他对人口問題的研究必須作出突出的貢獻，于是写出了划时代的第四章的第三节；在这里，不像在他之前的詹姆斯·穆勒，他公然主张避孕是“阻止人口增长超过粮食供給增长速度”的最好“办法。”

为了全面了解产生普雷斯的著作的环境，我們必須回顾一下葛德文的《論政治正义》（1793）^③和《探究者》（1797）的出現，这两

① 菲尔德：《英国人口論的早期宣传运动》，第 221 頁。

② 英国博物館藏演讲手稿（第 35153 号第 41 号卷宗），首次为菲尔德在上述著作中引用。

③ 《关于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与幸福的影响之研究》。

书以及康多塞的《历史簡表》^①以其發揮了烏托邦的、完美的、平等的和无政府的論点，促使馬尔薩斯出版了现在有名的《人口原理》。关于引起《人口原理》第一版出版的各种事件的詳情，讀者可以参考波那的詳实的記載。^② 这里仅仅提到一些比較直接的影响，如（上述的）普雷斯生活體驗的性质以及葛德文对馬尔薩斯《人口原理》的几篇答复，其中特别是第二篇引起了《說明与例証》一书的出版。

《人口原理》
的要旨

《人口原理》的学說，^③即便在今天，除对政治经济学有所研究的人而外，是时常被誤解的，因此，順便把它的内容扼要重述一下也許不算是繁贅吧。馬尔薩斯在第一版里——它的标题表明它值得一讀并具有爭論的性质——強調地說：（1）“人口增长必然受到生活資料的限制”，（2）“生活資料增加，人口必然随着增加”，（3）“由于貧困和恶习，人口增长的优势会受到抑制，实际人口会和生活資料保持平衡。”他提出了两点假定：（1）人需要粮食来維持生活，（2）在不同的国家的居民中和在不同的时期內，性欲都具有相对的永恒性。

虽然人口有这样一种能力和經常的傾向，即（在一个耕地面积有限而且土地报酬递减律起着潜在的或实际的作用的社会里），它的增加比粮食生产增加得更快，可是实际上它是受到积极的（死亡）和預防性的（限制生育）抑制的限制的。总之，馬尔薩斯对葛德文的财产必須平分的建議的回答是：假定各人的财产是均等的而且人人有均等权利享受集体生产的产品，假定沒有一个婚姻制度

① 《人类精神进步历史簡表》。

② 波那：《馬尔薩斯及其著作》1885年和1924年版。参看此书的后一版本（艾兰·恩文公司版）。

③ 《論人口原理和对社会的将来改革的影响，附对葛德文、康多塞等的臆說的評論》，伦敦，約翰遜公司，1798年版。

(葛德文曾把婚姻称为一种“欺詐”), 假定沒有一种純粹以理性为指导的制度, 則結婚将会很早而且很頻繁——因为供养来自社会基金, 各个生育儿女的人无需瞻养其后裔——, 人口将十分迅速地增加, 以致在很短的时期里, 均等分配的东西就会很少。由于土地报酬的递减, 粮食生产将下降而同时却没有力量可以抑制人口的增长。对有限的供应的競争就使承认私人所有权成为必要, 以免社会发生混乱, 婚姻的制度必須重新实行, 以使每个人負責瞻养其后裔。因此, 社会的这两个基本制度, 即我們所知道婚姻和私有财产制度应重新加以制定。馬尔薩斯爭辯說, 一个平等的社会很难树立, 更不能持久。因为我现在的目的是說明而并非批評馬尔薩斯的事, 我不預备談对这种理論提出的某些反对意见。很明显, 它的正确性不仅仅决定于不同性质的增长率——食物的增长是算术級数的, 而人口的增长是几何級数的——而且决定于人类是否永远是或将来永远是完全受理智指导的問題。葛德文向往着人类完全受理性的考虑的指导的时期; 对馬尔薩斯來說, 这是不可能的; 他认为“人的情欲在决定对事物的理解中永远是扰乱的力量。”馬尔薩斯认为社会大体上总是根据“自爱”的原則来运行的, 而葛德文則喜欢梦想一个完全由对別人的关心而不是对自己的关心所推动的社会。葛德文在他的《論政治正义》(在《人口原理发表前五年所写, 并預料到他的体系会被人們根据人口原理来反对)一书中, 推測两性間的情欲将逐漸减少而变为实际消灭,^① 馬尔薩斯回答說, 沒有理由可望出现任何这样的結果。而葛德文认为人类的生命最終会无限延长这一点也是不合理的; 即使如此也只会加重問題的严重性。只因为我們不知道进步的极限而就根据部分的进展

① 《論政治正义》(1796), 第2卷, 第8篇, 第9章。在他給馬尔薩斯的第二次答复中, 这一观点还没有形成, 但已出现了这个观点的一个变种。(第366頁)

推断将会有无限制的进展,那是錯誤的。建立烏托邦是阻碍进步而不是推动进步。国家的貧穷和人民的困苦几乎完全是由于人口增加过速而不是(像葛德文所主张的那样)由于人类的制度和安排中所固有的缺点所致。在第一版《人口原理》快結尾的地方,馬尔薩斯說:“毫無疑問,这是一种最令人灰心的想法,以为使社会不能有非常的进步的重大障碍乃是我們永远不能希望加以克服的〔重点是我加的〕。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生活資料这种永恒的趋势,是生物界一般规律之一,我們不能有任何理由期待它会改变。然而,尽管对这种困难的考虑必然是令人灰心的,对于那些可佩地努力于使人类进步的人們說来,任何把这問題含混过去,或把它擱置一旁的尝试,显然不会产生任何可能的益处。相反的,那种由于真理是令人不愉快的,就不敢正視真理的沒有大丈夫气概的行为,只能产生最悲慘的不幸。”^①

第二版是一
部著作

在1803年出版的第二版^②里,馬尔薩斯緩和了第一版《人口原理》的某些較严峻的意见,使这部作品减少其足以引起爭辯的“小册子”的色彩,而成为一篇合乎歸納推理的論文,因为他在第二版中引用了大量关于这一原理在許多国家和許多时期里运用的例証,并增加了“道德抑制”这种比較能給人以希望的抑制。第一版很多地談到社会的完美性,而很少談到救貧法;在第二版和随后的版本里,重点和討論的次序都顛倒过来了。人口增殖不再需要通过恶习和貧困来消极地加以抑制;人口压力的后果可以由于采用迟婚的办法而避免。增加的比例被保留下来;而馬尔薩斯对救貧法的批評被扩大

① 《人口原理》(1798年版),第346頁。

② 书名已改为《人口原理;或关于人口对人类幸福过去和现在的影响的看法;附对于我们将来消除或減輕它所引起的弊害的前景的研究》,这是一个新版本,篇幅已增加很多。伦敦,約翰遜公司,1803年出版。

了。这种救貧法被认为仅仅是止痛剂，只会加深原来打算防止的不幸。因此，在发了适当的通知以后，就应予以废止。

葛德文的
优越地位

尽管馬尔薩斯的論証是令人信服的，但还是隔了若干年之后，他才得了一个和他在真实姓名揭露后狼籍的声名相当的好名誉。在《論政治正义》和《探究者》的初版出版以后，甚至在《人口原理》出版以后，葛德文在輿論界的领导地位还是不可动摇的。“在我们的时代，”哈兹列特写道，“沒有一部著作曾給予我国的哲学家这样沉重的打击的……湯姆·潘恩当时被认为是他笔下的一个傻瓜；佩萊是一个老嫗；艾德蒙·柏克是一个华而不实的詭辯家。”^①英国社会主义史家比尔說：“一天早晨，葛德文突然醒来，成了当代最有名的社会哲学家。”^②

然而葛德文失去他的优越地位几乎像他得到它一样快。他曾一度是討論的中心，如今却大半被遺忘了；雪萊甚至于有一个时期怀疑他是否还活着。

他的声誉何
以逐漸衰落

那把火炬曾經点燃了人类的心灵，重新激起了人們对較好的秩序的希望，然而只閃爍了一下便熄灭了；——它是被堆叠在它身上的无休止的批評所窒息的。“这一股下流的漫罵的和偏狹的洪流，”正如葛德文对向他和他的著作提出的尖銳批評所下的不无相当道理的按語所說，使許多人修改了他們原先对这种新的极端的哲学所持的态度。馬尔薩斯的《人口原理》在这种批判里占着重要地位，并不是因为

① 哈兹列特：《論葛德文》，載《时代精神》，第183頁，或《哈兹列特全集》第4卷，第201頁。林德賽·罗吉士教授在为《論政治正义》的普雷斯登版本（紐約，諾夫公司，1926年）写的編者序言里，引用了这句话。

② 比尔：《英国社会主义史》，第1卷，第114頁（伦敦，1920年版）。罗吉士在上述书中引用此語。